

记·楚世家》“康王宠弟公子围……使郑……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的记载。“斄”读为“殇”，“王围斄”意即楚灵王死了。

三 关于历史事件和铸造年代

尽管苏博剑的铭文清晰可辨，但因各家对于词汇含义理解不同，因此对铭文涉及的历史事件的推定也各不相同。

1. 伐麻之战及其年代

“伐麻”，诸家多理解为即《左传》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所载之“冬，吴伐楚，入棘、栝、麻，以报朱方之役”，亦即《史记》所载“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之战。但李家浩坚持认为，剑铭所记第一次战争发生在“初命”之时，即“伐麻”是余祭即位为王之后，初次命令他的弟弟余昧出征，年代显然应该在余祭元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具体在当年的二月至三月之间。吴镇烽认为，昭公四年吴伐楚，取三邑，时值余昧六年（公元前538年），余祭早已作古，如何能命令余昧去伐麻呢？他认为余祭在位时期的“麻”可能是一个未见经传的小国，是楚国的附庸，所以最先受到吴国的讨伐。董珊则根据《左传》的记载，认为剑铭所记“伐麻”之事不见于文献记载。

伐麻之战的年代是这次研讨会关注的一大焦点，因为它关系到两剑的铭文能否“校经证史”，亦即能否通过两剑铭文解决长期以来吴王余祭与余昧在位时间的争议。程义、张懋镛、曹锦炎、周亚4位专家认为，“初命伐麻，败麻，获众多”就是昭公四年的伐麻之战，也就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载的余祭七年“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之战事，麻即三邑之一。因为如果余祭在位只有4年的话，就不可能有余祭七年的记录，所以余祭和余昧在位的年数就只能以《史记》为准，即余祭17年，余昧4年。但是董珊、吴镇烽、李家浩3位专家表示，不应该轻易否定《左传》的记载。董珊特别指出，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阖弑吴子余祭”之事是当时众所周知之事实，并列举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申公巫臣之子屈狐庸出使晋国时，与赵文子的对答内容为证，认为晋国很清楚余祭之死和余昧继立，余祭死亡的时间应该以《左传》记载为准。

2. 御荆、御越及其年代

“命御荆，荆奔”，程义认为此次战争应即《史记》所载的“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李家浩认为发生在余祭二年到三年间（公元前546—前545

年）；曹锦炎指出，此次战役，绍兴剑铭记为“荆伐徐，余亲逆袭之，败三军，获车马，支七邦君”，并以此推定“王围”为“楚灵王围”之简称；周亚认为，“命御荆，荆奔”应是《左传·昭公五年》所记载的“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栝、麻之役……闻吴师出，遽启疆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的战事；董珊认为，“御荆”是否就是指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一事，仍有待更多证据。

“命御越”，程义认为即《左传》记载的昭公五年（公元前547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也就是绍兴鲁迅路剑所谓的“支七邦君”之战。李家浩认为，其年代当在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余祭临终命余昧为王之前。从铭文来看，这次战争是越伐吴，吴以战败而告终。《左传》所记是吴伐越，可能是为了报“御越”之役，其结果是吴王余祭被越俘阖人所弑。曹锦炎认为即昭公五年楚联合诸侯伐吴之战，因为与前二次战役吴军取得胜利不同，这次只是吴国未被敌军打败而已。所以，姑婆皮难追述自己“战功”时将其附于后面，这样就可以解决时序前后倒置的问题。周亚另辟蹊径，认为这段铭文可以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阖，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阖以刀弑之”的记载来分析，认为吴王余祭是伐越后被弑，这一点上剑铭和文献记载相同，但剑铭记录的可能是事件的真实过程，《左传》等文献记载的则可能是根据吴人为掩饰余祭兵败被杀的事实而编造的情节。董珊认为“御越”一事，似可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人伐越”之事相对照，吴伐越事亦见载于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之《吴伐越》一章。

3. 铸造年代

由于对铭文理解的不同，诸家对两剑的铸造年代也有意见分歧。张懋镛、程义、李家浩认为，虽然两剑可能并非同时铸造，但相隔时间不会长，应该是吴王余昧即位之时，即公元前543年。吴镇烽认为，苏博剑的铸造年代，一方面从剑铭自称“吴王姑雘于雘”可知，铸剑时余昧已经继位；另一方面剑铭未提及余昧八年（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楚将薳泄伐徐和余昧十五年（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师从徐国返回、吴军在豫章将其打败等辉煌战绩，可以判断此剑铸造于余昧元年到八年（公元前536年—前529年）之

间；再结合剑铭的“馯馯郟命我为王”分析，该剑极有可能是余昧即位的元年即公元前536年铸造。而鲁迅路剑的铸造年代应在余昧十五年到十七年（公元前529年—前527年）之间，以“余亲逆，攻之”推测，最有可能铸造于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的当年或第二年。周亚根据苏博剑的铭文内容分析，余昧在铭文中强调自己的军功及继位的合法性，所以此剑应该铸于余昧即位不久；绍兴剑则记载了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即余昧二年时，吴、楚之间一场因楚伐徐而引发的战争，战争以余昧亲征、击退楚军、大胜获俘而结束，所以应该铸于余昧二年或稍晚，略晚于苏博剑。董珊认为，综合来看，苏博剑记载“命初伐麻”、“命御楚”、“命御越”、“命代为王”四事，年代都在余祭在位时；鲁迅路剑记载“初命伐口”、“亲进攻楚”二事，分别在余昧即位之前、之后，所以两柄余昧剑所记史事并无重合，鲁迅路剑的年代显然晚于苏博剑。

四 关于剑的形制特征

苏博剑为一字窄格有箍式剑，和鲁迅路剑及吴越地区常见的青铜剑有较大差异，较为少见，所以其形制、渊源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议题。

李学勤指出，苏博剑的铸造工艺、铭文制作等都已经非常成熟，鲁迅路剑的成熟程度也相同，只是类型不同，当时应该有各自的名称。不同的类型、相同的成熟度说明当时吴国各种类型的兵器都已有了成熟的发展，这类剑一定经历了一个长的发展阶段。如果说这把剑源自另一个国家，无论是从考古资料还是从文献记载来看都毫无根据。

李伯谦曾在《中原地区东周铜剑的渊源》一文中关注过中原带格双箍剑的来源，认为起源地在吴越地区，源头是曾在安徽屯溪、浙江温州等地出土的带两个耳朵的短剑，并且还可以追溯到江西吴城。他提示说，这类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突然出现，值得继续探讨。

姚晨辰收集了11件此类形制剑的资料，并进行了类型学分析。他指出，该剑型出现于春秋时期，广泛分布于吴地和常年与吴国交战的齐、楚、越等地。他将这类剑的形制变化规律概括为：剑首从空首喇叭状渐变为实心圆盘首；剑茎从扁茎发展成圆茎；茎上之箍从单箍进化为双箍，从方箍演变为圆箍；剑格渐宽；剑身从中脊起凸棱发展成为线形直脊，从无镦发展到有镦。从江苏吴县消夏湾春秋早期一字格剑来看，方箍可能是铍

在铸接剑首时留下的铸痕，后来慢慢演化为圆箍。他认为，一字格有箍式剑是一字格剑向宽格剑过渡的产物，是青铜剑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必然环节。

五 关于吴越文化研究

此次研讨会还围绕吴越文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李学勤指出，我们以前对吴越文化在整个古代社会的作用可能估计不够，大家熟知的文献基本集中于吴越争霸，但近些年发现的新材料能够对有关的记载和认识起补充、修正、改进的作用。

第一，吴国在西周所处的地位并非如有些学者想象的：太伯、仲雍奔荆蛮后直到寿梦时期才和中原发生关系。其实，宜侯矢簋出土地点是明确的；同出器物是明确的，比如角形器是江苏一带的特色；铭文里“东国”是明确的，绝对不是靠近河南，而是更远的地方；铭文里的“虞”就是“吴”；铭文里提到“厥川三百”，一个诸侯国有三百多条河流，一定是在一个水网地区。宜侯矢的分封是周王朝一个大的战略部署。西周的兴起最重要的是向东向南，宜侯矢簋铭文开头便是“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湖北的曾国，现在大家公认就是随国。随国最初是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适的封国，目的是统治和保护淮夷，是一个大的战略举动。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关于宜侯矢的战略部署其实是类似的，吴国实际上起了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很好地考虑。为什么学术界认为吴国和周王朝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国语·晋语》一开头就说的“询于八虞，而谕于二虢”，应该与泰伯、仲雍有关。

第二，关于对越国的认识。越国最后并没有灭亡，而是归于破散，回到氏族社会，之后又分为南越、东越、瓯越等。实际上越和南洋考古学是有密切联系的，浙江鄞县铜斧上羽人划船的花纹与菲律宾出土的花纹是一致的。越国最重要的阶段应该是战国前期到中期，但这一段的文献非常少，《左传》到《战国策》之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古本竹书纪年》也没有几条材料，所以战国前期的许多事情都不清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8—1931年洛阳金村虜羌钟出土以来，有些历史问题说不清楚，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把越国说清楚。虽然铭文没有提到越国，但许多事件和越国密切相关，这些在清华简里都很清楚。比如越国和鲁国打败了齐国，齐国向越国贡献土地、奴隶，进行和解。越王翳气派很大，鲁国国君为他驾

马、齐国国君给他驂乘。越国的历史作用非常大,烟台大学硕士生陈民镇的硕士论文提出,越国霸业直到州句时期,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对。这和我们的发现一样,州句的剑乃至兵器特别多,因为整天打仗。王翳的兵器也不少,所以越迁琅琊可能还是事实。在山东很多地方,包括新泰周家庄都出土越式的器物。因此,越国的历史作用可以结合兵器加强研究。

李伯谦对会议做了简单总结,认为会议虽短,但涉及的面很广,诸如苏博剑的铭文、形制、铸造等,除少量字、词的释读、史实的考订需要进一步探讨外,基本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他谈了三点意见。首先,肯定了展览和研讨会以“兵与礼”为名称。他指出,兵器许多时候就是礼器,礼器和兵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余昧剑铭功记事,具有礼器的性质,很好地证明了礼器的源头是兵器,应充分肯定其历史价值。其次,以《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一文为基础,对苏博剑的形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已如上文述。最后,肯定了吴文化学会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评价近年考古发掘的无锡阖闾城、苏州木渎古城遗址对于吴文化研究是很重要的工作。他指出,以前的吴文化热基本上都是围绕墓葬、青铜器,而重视这类遗址并将之作为都城遗址来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的重点加以重视。

林留根评价苏博剑称得上是吴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大发现和重要突破,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兵器。剑身的75字铭文与《史记》、《左传》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吴越重大历史事实有密切的关联,它的发现将会推动吴文化研究的深入。吴国青铜兵器最为著名的制造工艺为复合剑、暗花纹、剑首同心圆技术,被誉为吴国青铜兵器三绝。比如,复合剑根据剑脊需要坚韧、剑刃需要锋利的特点,在脊部和刃部分别使用两种不同成分的合金,使得剑体外锐内韧、刚柔兼备。复合剑的技术思想和工艺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在剑、矛等兵器上装饰菱形纹、米格纹、曲折纹、火焰纹等暗花纹技术也是吴国兵器的一大特色,美轮美奂、领先时尚的吴王夫差剑是暗花纹兵器的卓越代表。暗花纹技术的机理还有待科技考古的进一步探索。

毛颖梳理了吴文化研究的历程、取得的成果

及有待解决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吴越史地研究会、80年代吴文化研究会(后更名为吴文化学会)成立以来,吴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特别是50年代的湖熟文化研究与出土青铜器研究、70年代的土墩墓发掘与研究、80年代的青铜器研究热潮,21世纪以来的城址、墓葬发掘与研究,青铜器修复保护,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结合以及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等,为地域文明的探索与遗产保护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祚短、时局乱、资料散、铭文难、吴越文化面貌特征不易区分等原因,致使吴文化研究争议多、定论少,一些问题的研究均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提供新的资料,有待考古学、文物学、古文字学和科技考古等学科与领域的共同合作,有待利用其他考古学文化成果特别是其新资料作对比研究,组织更多的专题讨论,以已知求未知、以确定证不确定,并尽可能区分吴越文化面貌特征。她表示,《东南文化》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并及时发表吴文化新资料和新成果。

钱公麟提出,研究吴越文化时要注意江苏淮阴高庄、运河村,无锡鸿山和浙江安吉的几座大墓,越国的问题如果和无锡鸿山越墓进行比较研究的话会比较清楚。但他认为,宜侯矢簋和吴国关系不大,因为镇江地区的墓葬、青铜器很复杂,没有体系,一件青铜器的来源有多种途径,与宜侯矢墓相关的遗存在镇江也没有系统的发现。关于吴越区分问题,他认为吴越文化研究需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但不能将吴、越分开研究。但今后若能区分,将很有意义。

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基本解决了两柄余昧剑铭文的隶定问题,余祭、余昧与金文对称的问题,对吴国王位的继承制度也有了清晰的认识。但是,对于大家非常关心的“余祭、余昧王年”问题,会议依然有较大的分歧;对于“姑雘”、“姑发”、“姑嫫”的关系问题,专家们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均需要作进一步的研讨。

(附:本文根据提交论文和会议发言整理、归纳而成,未经专家审阅,误解或未尽之处均由本文作者负责。会议论文集将择机出版,各位专家的观点以论文集为据。)

(责任编辑、校对:毛颖)

“Arms and Ritual: Symposium on the Sword of Yumo, King of Wu”:

A Review

CHENG Yi¹ CEHN Wei²

(1. Suzhou Museum, Suzhou, Jiangsu, 215001;

2. Suzh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Suzhou, Jiangsu, 215001)

Abstract: The Symposium “Arms and Ritual: The Sword of Yumo, King of Wu” was held in Suzhou Museum on May 18, 2015. The sword of Yumo is a collection of Suzhou Museum. Centering on this sword, attending scholars conducted heated discussions regarding its form, inscriptions, and the related terminologies and historical facts. Agreement was achieved on the forms of the inscribed characters. Different opinions, however, remain on the date of the Battle against Ma (Fama Batt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fa” (姑发), “Guchou” (姑雠) and “Gufa” (姑嫠), and the manufacture year of the sword.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Wu and Yue cultures, particularly the former,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Yumo; bronze sword; King of Wu; inscriptions; Wu culture; Yue; Chu

《东南文化》征稿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年创刊,目前被列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HS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期刊……

《东南文化》于2009年改版后,定位于中国大陆东南及港、澳、台地区乃至日、韩等东亚诸国文化遗产的探索、研究、保护、展示与利用等,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从保护、研究、管理到继承、欣赏、展示诸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的关注,以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内容、新趋势和新要求,凸现文化遗产地位,彰显东南地域特色,并努力打造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主要栏目有:东南论坛、遗产保护理论、考古探索、地域文明、博物馆新论、专题研究、域外广角等。

《东南文化》真诚欢迎专家学者投稿,尤其欢迎有关遗产保护和相关学科探索的理论文章。现将稿件格式启事如下:

一、敬请作者提供文稿的同时尽量提供电子文本。文章的题目、100~300字的内容提要、关键词、作者单位需提供中英文各一份,并附作者简介(出生

年月、工作单位、职称、主要研究方向、邮政编码)。

二、来稿以1万字内为宜,并要求文字精炼、标题准确、层次清晰、资料新颖、观点鲜明、图文并茂;引文核对准确,注释一律置于文末并注明详细出处;线图、拓片及照片质量精美,凡线图、拓片及照片为复印件的来稿,一概不用。

三、自收稿之日起,编辑部将在6个月内答复处理意见。如在此期限内未收到录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稿件并告知我刊。稿件一概不退,敬祈自存底稿。

四、本刊将已刊内容提供网站传播,为维护作者权益,免生著作权纠纷,凡不愿网络传播的作者,请在投稿时予以声明。

五、稿件请寄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登记或遗失。

更为详尽的征稿启事请登陆《东南文化》网站(<http://dnwh.njmuseum.com>)查询。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16

电 话:(025)84841253

电子邮箱:dnwh@chinajournal.net.cn